

## 历史学研究

# 新中国建立之初政治认同的构建

——以天津搬运工人为例(1949—1956)

邓红,齐凯君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搬运工人是天津工人阶级中古老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初搬运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中国共产党通过消灭脚行的剥削,改善工人的生活,获得工人的利益需求的认同;并以搬运工会为依托和纽带,实施搬运工人的劳动保护、社会救济和其他福利待遇,增强了搬运工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系统的文化启蒙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搬运工人树立了领导阶级的意识、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对共产党认同也升华到价值认同的层面。搬运工人开始向共产党和新政权靠拢,提高了执行政策、方针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搬运工人对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是建国后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进行社会改造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 天津;搬运工人;政治认同;脚行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14)02-0077-07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所属的政治系统产生的情感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使人们能够自觉地支持和维护该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具有积极作用。对建国初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获得工人阶级的政治认同对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但是新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使然”<sup>[1]</sup>。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学术界的研究却出现了呼应乏力的状况:建国后,工

人阶级对党的政治认同被视作是“理应如此”的事实,工人政治认同形成的路径和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努力并没有进入到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后,这种相对空白状态得到一些改善:现有的研究成果,从地域来看,多集中于上海<sup>①</sup>,专门以天津为中心的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就时段而言,呈现“两头重中间轻”的状态,即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工人阶级的认同,建国初30年的研究相对鲜见;从研究的范围看,把工人阶级作为总体进行研究,或以产业工人

收稿日期:2014-0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70010)

作者简介:邓红(1964—),女,重庆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sup>①</sup> 如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袁进、丁云亮、王有富:《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4月;林超超:《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等。

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多<sup>①</sup>,针对搬运工人的专门研究属于薄弱环节,研究的现状与搬运工人的庞大数量和所起作用极不相称。笔者希望能在深入挖掘史料和学习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力图有所突破和新意。

本文以天津市的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sup>②</sup>的研究视角,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以“天津工人阶级形成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参与者”<sup>[2]115</sup>搬运工人为分析样本,分析建国后工人对共产党政治认同形成的过程,并见微知著,管窥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造的艰难和曲折,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

### 一、搬运工人的阶级经历:政治认同形成的历史背景

天津依河傍海、京畿屏障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演进,造就了搬运业的发达和搬运工人数量的庞大。解放前天津市的搬运行业由脚行垄断占据,脚行利益传承,子孙世袭,对客商横加勒索,对工人残酷剥削,被列为天津的“十大恶”之一。

建国初,天津全市11个区有二百多家脚行,控制约四万多名搬运工人<sup>③</sup>,包括运输、码头、铁路装卸及三轮、人力车工人。脚行内部有严格的等级结构和组织系统,严密控制,层层剥削,搬运工人除了丧失人身自由,形成对固定的脚行的人身依附关系外,收入是极其微薄的,他们“劳动收入的70%~80%被把头剥削,有的甚至达95%以上……更有的脚行长期实行‘底钞制’,即运费全部归脚行头,工人所得任凭脚行头‘赏赐’,多少不得争执”<sup>[3]115</sup>。不仅如此,脚行把头为争夺地盘,驱

动工人流血械斗,为其利益生死相搏,工人轻则打一架了事,重则丢掉性命,成为脚行间利益争斗的牺牲品。特殊的历史遭遇使搬运工人虽然具备了工人阶级一般性的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与产业工人迥异的政治生态,使其政治认同的形成更为艰辛曲折:搬运工作的性质使工人分散全市,指身过活,时刻流动,聚散无时,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由于脚行是传统帮会组织滋生的温床,搬运工人成分复杂,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并且搬运工人对其所在的脚行有着严重的依附感,认为脚行地界的划分事关自己的饭碗和切身利益,甚至认为“跟着头子有饭吃”“取消了头子地盘站不稳”<sup>[4]</sup>。虽然工人面对脚行的残酷压迫也有朦胧的反抗意识,但处于自发的、零散的状态,且限于经济斗争的层面,思想观念还被束缚在行会主义的意识中,阶级意识处于休眠状态。

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初期,曾以城市为中心,组织工人运动,但就总体而言,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与机器大工业相联系的产业工人身上,苦力工人相对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国民大革命后,迫于国内形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在工人中间的活动和影响更为有限。由于搬运工人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搬运工人中影响的非连续性和有限性,建国初搬运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及与工人的关系,认知是相对模糊的,更不用提政治认同了。

天津解放后,怎样才能获得工人的认同,巩固执政地位,就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关键问题。刘少奇认为要使工人完全可靠,“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sup>[5]421</sup>。政治认同是指

<sup>①</sup> 如华尔德(Andrew G. Walder)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sup>②</sup> 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sup>③</sup> 由于相关资料因统计方法和范围不一致,导致数字统计有所出入。本文采用的是天津档案馆藏,《一九四九年搬运工会工作总结计划及运输公司关于天津市搬运工人工作总结》中的统计数字,共计四五九六九人(档号:X53-1-242)。

人“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规范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sup>[6]501</sup>。在政治认同形成的系统中,利益起基础性的作用,组织认同满足人归属的需求,是政治认同形成的依托和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和升华,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确保工人利益作为获取工人认同的出发点,并把搬运工会作为保障工人利益的组织载体,通过系统的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搬运工人切实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对共产党产生了感情上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 二、确保物质利益:政治认同的起点和基础

解放前,脚行头用金钱勾结官府,用财势收买镇压,其势力范围一直受到旧政权的承认和维护,不仅在其统治下的工人命运凄惨,工商市民也深受其苦:在脚行区域内的商民“必须雇佣所在地脚行,不许外雇,如经发现,照规矩索‘过街钱’其数目不小于雇佣费,否则不准拉走或打架斗殴”<sup>[7]4-5</sup>,商民为了免除麻烦,只能遵从“规矩”,天津市的运价也被抬得非常高,严重地阻碍了物资的交流和工商业的恢复。摆在天津市政府面前的严峻任务是取消脚行对工人的剥削,切实增加工人收入,并在保障工人生活的基础上限制运价,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一)消灭脚行的中间盘剥,增加搬运工人的实际收入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3月开始,天津市陆续成立搬运工人服务站,逐渐取消把头制

度,工人们挣钱不再靠签<sup>①</sup>,承揽业务和分配所得完全由工人自己进行评议决定,开始对搬运行业的集体化改造;6月25日,天津市召开了搬运工人代表大会,工会的基层组织纷纷建立起来;7月4日,天津市运输公司正式成立,隶属于搬运工会,统一承揽装运业务、调配工人,与公司企业订立搬运合同,统一全市运价,实行按劳取酬的劳动制度,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也掀起了反把头斗争。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通过《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反脚行头的斗志,从1950年6月开始,天津对脚行把头进行全面登记,对其中有严重罪行的脚行头子进行审判和依法惩处。禁锢人民二百余年的,积存了无数血泪的脚行制度被摧毁,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被连根拔除,广大搬运工人真正翻身做了主人,这是搬运工人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起点。

### (二)合理确定运价,保障工人长远利益

天津市搬运工会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确定运价:一方面保障运价能维持工人的生活,另一方面确定标准,稳定经济秩序。由于脚行头的把持割据和高价勒索等历史原因,天津市的运价是非常高的,而压低运价从表面上会降低工人的收入,如处理不好,必然遭到工人的反对和阻碍。搬运工会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工人理解、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不在于运价的高低问题,而在于是否合理的问题。运价过高容易抬高物价,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且运价定得过高,外地商人也会因为中转费用过高而不愿从天津贩运货物,“如西北驻津办事处刘同志谈:‘他从市内送到火车上的运费,相适当于他从天津运到太原的运费’,东北同志也喊天津市内运价太高,来货折本了,今后难以再来”<sup>[8]</sup>。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工人从全局和长远角度考虑问题。由于消灭

① 工人上工之前先领“签”,没有“签”的一律不许干活。

了脚行头的剥削,消除了贪污中饱的寄生分子,天津市的运价尽管比解放前降低了72.8%,但工人的收入并未减少<sup>[9]</sup>,保证了压低运价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工人生产情绪的稳定。搬运工人地位的改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成为他们对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基础。

### 三、建立工会:政治认同的组织依托和保障

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组织的群众组织,目标是在工厂、企业乃至社会为工人谋求更大的利益,以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天津作为北方近代工业的发轫地,工人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共产党曾经在搬运工人内领导建立工会组织,但大革命失败后,工会组织转入地下,实际影响有限。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搬运工会,不仅成为推翻脚行制度的坚强堡垒,而且还成为团结工人的纽带和教育工人的载体,正如列宁所说,工会“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sup>[10]368</sup>。充分发挥工会团结和教育工人阶级的作用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的鲜明特点。

#### (一)搬运工会号召加强工人的互助团结

天津市搬运工会建立后,工人的福利工作也开始有领导地进行:“冬天到了,须皮袄,就跟皮毛公司去订货,团体购买,成批购置,是比较价廉而适用的。西货厂工人下雪天穿上了皮袄说:‘这是咱工会好,不然你那去穿皮袄’。运输工人徐玉麟拉着工人配售煤坐在车上得意的说‘一顿煤省几万,没有工会怎办到。’”<sup>[11]</sup>搬运工会还组建了工人互助会,遇到工人死亡残伤的情况,号召工人凑钱治疗或埋葬,工会也出钱帮助,协助工人伤亡抚恤。通过组织工人进行劳动力的调整和合作,也避免工人因争码头和收入的肥瘦不均而引起的纠纷,使工人之间疾病互助,婚丧帮忙,有无借贷,体

现了工人阶级应有的组织和团结。

#### (二)搬运工会加强工人劳动安全保护获得工人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非常注意加强对搬运工人的劳动保护:1950年1月28日,中国搬运工人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搬运工人疾、伤、残、亡待遇问题的暂行办法》;1951年7月12日和1952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防止搬运工人中毒》和《全国广大搬运工人迫切要求根绝搬运危险性物品中毒事故》两篇文章,呼吁“搬运部门对搬运毒性物品应规定必要的安全制度,备置必要的防毒器具,向工人进行安全防毒教育”<sup>[12]</sup>,保障搬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天津市搬运业发达,同时也是搬运伤亡事故的高发地,1953年11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起草了《天津市搬运工人安全卫生办法草案》,明确规定了搬运危险性物品工作中工人健康或生命受到危害时的抚恤待遇等<sup>[13]</sup>。并且由于搬运工人的“工作流动分散,工作多是在城市边沿地区,距市内较远,发生工伤事故不易急救治疗”<sup>[14]131</sup>,为此中国搬运工会1952年提出在设立固定和流动的保险箱和保健箱,这些保险箱和保健箱可以肩背手提,随着工人的工作而流动,避免了因延误治疗造成生命危险和威胁,充分体现了对工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重视和关心,增强了工人对新生政权的认可。

#### (三)搬运工会加大救济力度获得工人认同

建国后,“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加速发展经济,政府已经确定了高积累、低工资的经济政策”<sup>[15]25</sup>,但新生政权以工会组织为依托,逐渐建立并完善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政策,增强了搬运工人对新生政权和执政党的认同感和依赖感。建国后,天津市的人力车和三轮车大多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随着交通限制日趋严格,人力车只能运货,不能载客,收入日趋减少,以至于一些工人的生活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天津市加强对他们的救济力度。比如天津市七区人力车工人王文明,“独身一人,寒腿病已数年,享受救济已一年多,又

发给其棉衣及棉被等,自己说:过去我根本未穿过三面新的棉衣,拉一辈子车那是根本无人管,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好处,我早就冻饿死了。”<sup>[16]</sup>劳动保护和社会救济的实施,使工人深刻感受到工会对工人是负责的,在由搬运工会出面代表工人与工厂企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时,工人说“只要工会下通知,叫我们缴多少车份即缴多少”<sup>[11]</sup>,充分体现了工人对工会充分的信任和认可。不仅如此,工人以工会组织为依托,开始参与管理,选举和监督干部,实行会费和公款公开等民主化措施,使搬运工人更直观地感受到自己作为领导阶级的地位,“国家主人”这个抽象的政治口号,变成可触可感。搬运工会的建立和巩固,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得搬运工人政治认同的组织保障。

#### 四、加强政治教育:政治认同的升华 和最终确立

价值认同可以提高政治认同的自觉性和稳定性,主要是指对社会主流价值,即意识形态的认同。建国初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的文化启蒙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搬运工人对共产党的价值认同。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各级领导对广大职工的政治学习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49年4月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视察,指出工会除了应将工人组织起来外,还要“进行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工人树立新的人生观”<sup>[17]</sup>。随后,天津市以搬运工会为依托和组织,对工人进行广泛普遍的政治教育。工会根据搬运工人的分散、流动、不定时的特点,进行“三不固定”的教育,即没固定时间,没固定地点,没固定人数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短期训练班、上大课、夜校、业余学习班、学习小组和个人自学相结合,通过黑板报、电台、刊物、报纸等途径,在路口、货栈门口,甚至轮船、火车来前进行教育。运输工人李学汉说:“我从来未听说过我等这伙人,也能有学习机会,只知道每天过着扛呀,拉呀的生活,有谁给我们这伙人着想,只有在

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这群人才被重视。”<sup>[11]</sup>工人感受到新政权带给他翻天覆地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启发了阶级觉悟。

#### (一)搬运工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经过搬运工人第一次训练班的学习后,工人对党与工人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共产党为啥打仗,为谁打仗?虽口头也说是为工人阶级解放,但实际体会的是不够深刻,是不够承认的。经过这次学习,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二十八年,工人真正认识到共产党牺牲流血,是完全为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sup>[7]96</sup>在讲《共产党党章》后,运输工人赵师林说:“以往就不知道共产党组织是由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这才找到根,才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里边都是工人先进者。”不仅如此,训练班的学习和教育也激发了工人阶级对进步和入党的要求,“他们看到军大演出的‘刘胡兰’后,更感到共产党的光荣,三轮工人孙文贵说:看人家刘胡兰真是英雄,当个共产党员死了也光荣。”<sup>[7]95</sup>对共产党的认同升华到价值认同的层面。

#### (二)搬运工人强化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意识

搬运工会针对搬运工人的工作性质和需要确定教育的内容:“一是:爱护货物,运输迅速,价钱合理,便利流通。不勒索,不偷盗损坏,不要酒钱,拾物归还。二是:建设家务,不嫖不赌,反对贪污浪费,提倡廉洁奉公。三是:遵守交通规则,服从交警指挥,逮捕盗匪,维持治安,检举走私。”<sup>[18]18</sup>三轮车、人力车工人,由于过去受警察的统治压迫,积恨已深,解放后很多人仍然故意不受交警指挥,违反交通规则。在搬运工人的训练班上,派出所同志来讲课开会,使搬运工人对交通秩序的重要性有了重新认识,如运输工人高家麟说:“过去认为交警是我们这行工人死对头,还是他们有权,仍受他们统治,故有时故意和他们作对,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执行政府交通法的人,是为咱们办事,保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和以前看法不同了。”<sup>[11]</sup>并且,授

课干部态度亲切,平易近人,给工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三轮代表朱恩斌说:“干部对我们太热情,怕我们冷,给我们盖被子,马上叫我到台湾去工作,我也去。并且由不积极转变为小组骨干。”<sup>[7]50</sup>天津市公安局的局长许建国给工人讲课后,工人说:“以前都说我们是臭脚行,商家店员都不拿我们当人,现在局长和我们平起平坐了。”拿许建国同志给他们日记本上留的赠言到处去夸耀<sup>[11]</sup>。搬运工人逐渐展现了全新的阶级面貌:1950年1月15日到20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用局会同三轮工会检查三轮人力车工人驾驶执照及袖章,工人不仅在工作上积极配合,而且放下手上工作去帮助宣传,协助工作。“执照及袖章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要随身携带,根本不能向外借,如借给别人直接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自觉地拥护政府,热爱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任何人剥夺过去”<sup>[19]</sup>。充分体现了政治教育的效果。

建国后对工人的教育对于构建工人的政治认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工人划清了阶级界限,克服了雇佣、行会主义等落后思想,树立了领导意识、主人翁自豪感,责任感和新的劳动态度,使工人对共产党产生了感情上的认同感,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积极性,为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的进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五、结语

建国后搬运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脚行制度的推翻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搬运工人的生活日益得到改善和提高,并享受着劳动保险和劳动保护等待遇,工会组织把工人空前地组织和团结起来,并通过文化和政治教育,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正如刘少奇所说:“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

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sup>[5]425</sup>搬运工人开始向新政权、共产党靠拢,成为国家新政权最坚定的阶级基础,搬运工人政治认同的形成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变迁的缩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进行社会改造的典型例证。

工人阶级的政治认同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新时期伴随着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传统产业工人面临着收入和社会地位跌落,工人对党的政治认同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纵深中归纳总结、探寻规律,为加强新时期工人对党的政治认同、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提供启示和借鉴。

## [参 考 文 献]

- [1] 林超超. 新国家与旧工人: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J]. 社会学研究, 2010(2):83.
- [2]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 天津市档案馆. 旧天津的新生[M]. 周利成, 王向峰, 编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 [4] 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全国搬运工人情况报告[N]. 人民日报, 1950—04—03.
- [5]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 [6]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 [7] 中华全国总工会. 搬运工人工会工作参考资料[G]. 北京:工人出版社, 1950.
- [8] 市运输公司1949年搬运工人工作总结[B]. 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152—1—16.
- [9] 彻底废除封建把持制度,各地搬运事业发展迅速,二十五个城市建立了搬运公司,搬运工人生活得到改善,运价得到合理调整[N]. 人民日报, 1950—10—26.
- [10] 列宁.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M]//列宁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一九四九年搬运工会工作总结计划及运输公司关于天津市搬运工人工作总结[B]. 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53—1—242.
- [12] 防止搬运工人中毒![N]. 人民日报, 1951—7—12.
- [13] 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为呈请“天津市搬运工人安

- 全卫生办法草案“予以审查批准由”[B].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53-2-1856.
- [14]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1949年10月—1988年8月)[G].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 [15] 袁进,丁云亮,王有富.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 [16] 天津市劳动局关于三轮车、人力车、搬运工人救济工作的批复总结报告[B].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84-1-311.
- [17] 肖梅.解放初期天津工人政治启蒙教育运动概况[J].天津工运史资料,1986(5):30.
- [18] 安立夫.天津市搬运工人工作报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0.
- [19]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用局会同三轮工会检查三轮人力车工人驾驶执照及袖章工作总结[B].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154-1-133.

【责任编辑 郭玲】

##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before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Foundation

—Take the Tianjin Porters as an Example (1949—1956)

DENG Hong, QI Kai-jun

(College of Marx Educatio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an ancient yet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of Tianjin, the porters of Tianjin are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value i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By eliminating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orters, the Party laid down the fares and improved workers' living standard, which was in agreement with workers' demands of interests. Meanwhile, relying on the union of the porters, the Party sought for greater interest of the porters by providing labor protection, social relief and other welfare benefits, which in turn strengthened a sense of belonging as well as a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of the porters. And the systematic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a sense of pride, a sense of leadership an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s a master among the porters, leading to the sublimation of the sense of valu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 Porters began to draw close to the Party and their level of consciousness, initiative and creativeness was improved in carrying out the policies. Porter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munists Party of China was an epitome of the social chan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also served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successful social reform of the Party.

**Key words:** Tianjin; the porter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the transport guilds

## ウェーバー夫婦の教育改革思想について

宮敬才, 李柏紅<sup>2</sup>

(1.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2. 河北大学 マルクス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要旨: ウェーバー夫婦はイギリス近現代社会主義史の中で優れた代表であり、初期フェビアン協会にとっても主要な人物でもある。二人はロンドン政治経済学院の建設及びロンドン大学の改組に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ウェーバー夫婦の教育改革思想には、教育の平等原則、技術教育重視、教育の現実主義、及び教育多元化などの内容が含まれている。ウェーバー夫婦の教育改革思想及びその実践を分析し研究することは、私たちが更にイギリスの近代教育体制及びイギリス人の国民性を理解することに有益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ウェーバー夫婦; 教育改革; フェビアン協会; イギリス

## 地方高レベル大学における中外協力運営の効果分析

張素芹

(河北大学 国際協力所, 河北 保定 071002)

要旨: 現在の情勢のもとで、大学の中外協力運営はもう大勢の赴くところで、地方高レベル大学作りにおける焦点でもある。中外協力学校運営は以下四つの面に積極的効果がある: 優れた教育資源を導入し、資源の配置最適化を実現する; 国際化のレベルを向上し、国際化の人材を育てる; 新たな品質観を樹立し、教育の品質とレベルを高める; 「ナマズ効果」を引き出し、教育教学改革を深めること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中外協力学校運営; 地方高レベル大学; 効果

## 建国初期における政治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構築

——天津運輸労働者を例にして(1949—1956)

鄧紅, 齊凱君

(南開大学 マルクス教育学院, 天津 300071)

要旨: 運輸労働者は天津労働者階級の中で古くて重要な構成部分であり、建国初期、運輸労働者が中国共産党への政治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重要な実践意義と研究価値がある。中国共産党は運搬人夫への搾取を消滅し、労働者の生活を改善することを通じて、労働者が利益需要の共感を獲得した。そして運搬組合を頼りや紐帯とし、運輸労働者の労働保護、社会救済とその他の福祉待遇を実施し、運輸労働者の帰属感と共感を強めた。一方、系統的な文化啓蒙教育と思想政治教育を通じて、運輸労働者は指導者意識、主人翁の誇りと責任感を樹立し、共産党への共感も価値レベルに昇華した。運輸労働者は共産党と新政権に接近し、政策と方針の実行に対する自覚と積極性を向上した。運輸労働者は共産党への政治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過程は、建国後の社会変化の縮図であり、中国共産党が社会改造の成功典型例証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天津; 運輸労働者; 政治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運搬人夫